

张爱芹 王以第 著



红色文化 与道德建设研究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CHINA OCEAN UNIVERSITY PRESS

红色文化与道德建设研究

张爱芹 王以第 著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 青岛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色文化与道德建设研究 / 张爱芹, 王以第著. — 青岛: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08. 8
ISBN 978-7-81125-238-5

I. 红… II. ①张…②王… III.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中国 IV. D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28281 号

出版发行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香港东路 23 号	邮政编码	266071
网 址	http://www.ouc-press.com		
电子信箱	coupljz@126.com		
订购电话	0532-82032573(传真)		
责任编辑	李建筑	电 话	0532-85902505
印 制	淄博恒业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160 mm×218 mm		
印 张	11		
字 数	191 千字		
定 价	24.80 元		

红色文化：当代中国道德建设的活力源泉

——由汶川抗震救灾中两类不同行为想到的
(代序)

道德是文化的灵魂，是文明的核心，道德建设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道德进步决定着先进文化建设的性质和方向。建设和发展先进文化，就必须大力加强道德建设，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努力提升全社会的道德水平。

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先进的文化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影响着人的精神和灵魂，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仅要继承和弘扬我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继承和发扬“五四”以来我们党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过程中所形成的红色文化。中国红色文化是马列主义与我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继承和发展。从精神层面看，红色文化的主要内容有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集体主义精神，以及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言行一致、不尚空谈、忠于职守、爱岗敬业等优秀道德，还包括指导人们互动与解决困难的知识、信仰、价值和规范等。红色文化从其产生那天起，就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的积极意义在于使我们的人民、军队、民族乃至国家形成充实、健康的心理状态和进取向上的道德取向，它在传承与传播、碰撞和融合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它在发展中展现出鲜活的生命力和持久的影响力。

红色文化已经成为当代中国道德建设的活力源泉,这一结论的正确性再一次被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汶川抗震救灾的壮举所证明。

一、直面遭遇,共克时艰——社会主义道德的具体实践

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个日子:公元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省汶川,一场里氏8.0级的特大地震不期而遇,震感波及除了少数地区之外的整个中国大陆。数万生命顷刻间陨落,受灾严重的北川县城50%以上的民众遇难。这是一场猝不及防的灾难。遭遇了,就要勇于面对。一个月来,在中华大地上,规模空前的生死大营救,历经艰险的千里大驰援,处处涌动的爱心大奉献,共克时艰的社会主义大协作,汇聚成全民族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强大合力。

在灾后一个月的6月12日,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授权发布:据民政部报告,截至6月12日12时,汶川大地震已造成69159人遇难,374141人受伤,17469人失踪。这次地震破坏程度之惨重,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之最,在世界历史上罕见。危急关头,困境绝地,中国共产党人挺身而出。他们中有干部,军人,警察,医生,教师,工人,农民,学生……在2008年5月26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组部副部长欧阳淞说,据不完全统计,灾区共有17500多名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2288000多名共产党员^①投身抗震救灾一线,各级领导干部在抗震救灾斗争中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成为带领群众抗震救灾的主心骨。“我们在灾区看到,哪里灾情最严重、哪里危险最大、哪里困难最多,哪里就有领导干部的身影。”欧阳淞说,广大共产党员在抢救人民群众生命和灾后重建中冲锋在前,舍生忘死,在危急时刻充分展现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灾区各级党委和基层党组织始终站在抗震救灾最前列,行动迅速、领导有力,显示出强大的号召力、凝聚力和战斗力;非受灾地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全力以赴支援灾区。据初步统

^① 重要数字和事实材料均来自新华网。下同。

计,全国非受灾地区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中央企业共组建各类支援抗震救灾小分队近 1600 支,人员总数达 55000 多人,其中中共党员有 28000 多人。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数日之间,先后投入抗震救灾的部队总兵力达 13.7 万多人,来自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和武警部队,专业兵种包括地震救援、侦察、通信、工程、防化、测绘、气象、医疗防疫、修理等 20 余个,涉及范围之广、各种力量之多、投入速度之快,均创我军抗灾历史记录;投入抗震救灾工作的医疗卫生人员近 1.4 万人,医疗救治队伍覆盖到灾区每一个受灾村庄和受灾群众临时安置点。迅速、有序、高效的救援工作,既是 16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资金、物资和人员援助的共同结果,也受到世人的高度赞誉。

中华民族在灾难面前众志成城、万众一心、不畏艰险、奋力救灾、共克时艰的伟大壮举感天动地。震后一个月的 6 月 12 日,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授权发布了以下一组数据:

据民政部报告,截至(6 月,下同)12 日 12 时,全国共接收国内外社会各界捐赠款物总计 448.51 亿元,实际到账款物 429.21 亿元,已向灾区拨付捐赠款物合计 139.66 亿元。据民政部报告,截至 12 日 12 时,向灾区调运的救灾帐篷共计 110.98 万顶、被子 477.20 万床、衣物 1400.95 万件、燃油 94.77 万吨、煤炭 202.46 万吨。据住房与城乡建设部报告,截至 11 日,地震灾区过渡安置房(活动板房)已安装 92500 套、正安装 27800 套、待安装 90800 套,生产地已发运 57400 套、待发运 69600 套。据总参谋部报告,截至 11 日 24 时,抢险救灾人员已累计解救和转移 1400052 人;据卫生部报告,截至 12 日 12 时,因地震受伤住院治疗累计 95516 人(不包括灾区病员人数),已出院 77437 人,仍有 15478 人住院,其中四川转外省市伤员仍住院 9218 人,共救治伤病员 1419542 人次。据财政部报告,截至 12 日 12 时,各级政府共投入抗震救灾资金 236.07 亿元,中央财政投入 190.09 亿元,地方财政投入 45.98 亿元。水利部报告,截至 12 日 12 时,受损水厂 8426 个,已修复水厂 6033 个;受损供水管道累计 47642.5 公里,已修复 40154.3 公里。四川 34 处

堰塞湖中,已基本排险 11 处。据交通运输部报告,截至 12 日 12 时,公路受损里程累计 47286 公里,已修通 46068 公里。

这是一种无比坚强的中国力量!它在人的生命救助所需要的黄金时间里迅速集聚,又能够在震后“一省帮一县”的恢复重建中延展。这种中国力量同时受到国外的无比关注,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文章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展现出了巨大的自觉的动员能力,并且在这种社会自觉的动员能力中,人们发现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凝聚力;法国《欧洲时报》称,中国在进步,中国政府在进步,中国人的素质在进步,中华民族在灾难面前所表现出的民族精神在升华。今天,我们可以说,在惨烈的地震废墟中站起的是一个写大的“中国人”。

大灾大难方显大仁大义,为难之时给我们留下无数感动。在这场自然灾害面前,涌现出无数最可爱的人,他们的善举让我们永远铭记。

在灾难发生的第一时间,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先后多次赶赴灾区,在抗震救灾第一线亲临指挥,安抚受灾群众,而且反复强调:“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抢救生命是第一位的,是压倒一切的。”

四川公安消防总队成都支队支队长孙国利,5 月 12 号地震发生时,以高度的职业敏感性和最快的速度,与战友们冲到楼下,在消防车前召集了不到 1 分钟的紧急党委会,决议只有 8 个字——“一级战备,全力救人!”

广东省抗震救灾医疗队护士刁冬梅在救援现场的那一刻感到,我们与被救者“已经不仅仅是医生和伤员的关系,而是患难与共的骨肉同胞!”

蒋晓娟义务为一些急需哺乳的地震灾区孤儿喂奶,却“狠心”把自己才 6 个月大、同样需要母乳喂养的孩子交给父母照料。

28 岁的蒋敏——四川省彭州市公安局羌族女民警、三级警司。在灾难中,她的父母、女儿、奶奶、外婆,全家十口人永远地离开了她。然而,面对残酷的生离死别,为争取更多灾民的生存和获救机

会，她毅然放弃回北川寻找亲人，连续奋战五昼夜，因劳累过度，多次昏倒在抢险救援现场，被百姓誉为“最坚强的警花”。

5月12日，中央电视台记者张泉灵，是在做完一个月的奥运火炬珠峰传递报道工作之后刚刚回到拉萨，大地震发生时她的第一反应是：“这可能是比32年前唐山大地震更大的一次灾难，而前方灾情不明！情况不明的时候是最需要记者的时候！我得去现场！我知道高原下撤以后的第一原则是休息，我也很想家，想不满两岁的儿子。但是这时候到一线去，不是我个人的选择而是一种职业的天性。”

灾情就是命令。阿坝州公路管理局在第一时间成立了道路抢通突击队，出动三台50型装载机，从马尔康向汶川方向开进。而作为阿坝州公路管理局刷经寺分局经验最丰富、技术过硬的职工，现年54岁的装载机操作手义德阳主动请缨参战。

从成都到理县的空中航线，被飞行员们称为“死亡航线”。在这条航线上，尽管他们一次次化险为夷，把“死亡航线”变成了“生命通道”，但不幸还是发生了。5月31日下午，邱光华机组奉命运送卫生防疫专家到理县。返回途中，在汶川县映秀附近，突遇低云大雾和强气流，于14点56分不幸失事。机长邱光华，副驾驶李月，机械师王怀远、陈林，士官张鹏5人及14名搭乘人员失踪。

今年只有9岁的林浩是四川地震灾区汶川县映秀渔子溪小学的二年级学生，他在倒塌的校舍自救后，马上用弱小的身体将一名昏迷的同学背了出来。随后，他重返已倒塌的校舍又背出来一名昏迷的同学，并被塌方砸伤了胳膊。

当大地震发生时，为了转移吓呆了的两个学生，一位瘦弱的女教师挺身上前，孩子安全了，她却倒在了血泊中，不省人事。她的名字叫王敏，今年26岁，是陕西省宁强县黄坝驿乡九年制学校教师，面对大家的赞扬，她只是淡淡地说：“我只是做了一名老师应该做的事情。”

正在上课的无数教师在灾难降临的那一刻站了出来，用他们的沉着、冷静、机智，甚至鲜血生命，挽救了无数个花朵般的生命。

奏响了无数次荡气回肠的生命颂歌。他们把生的希望留给學生，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那一刻，我们更深刻感受到“为人师表”的真正含义。谭千秋、苟晓超、袁文婷、严蓉、杜正香、吴忠洪、张米亚、汤宏、瞿万容、张辉、聂晓燕、刘宁……是他们用自己的无私无畏向世人展示着他们的良知，用鲜血甚至生命维护师尊，铸就了师魂。

这就是我们在这次抗震救灾中见到的一个个在大灾大难之时的感人场景。正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使一个个救人行动获得了成功。灾区人民、各行各业的人们在大灾面前，表现出了临危不惧、坚忍不拔、以己所长、尽己所能、自强自立、自救及救人的精神，用爱、奉献和努力见证着中华民族的坚强，书写着人间真情、善良人性的光辉！“只要有一线希望，只要有生还的可能，就要付出百倍努力”，这是党在救灾行动一开始就提出的口号，也是千万名救灾人员的实际行动。正因为动作如此迅速，如此矢志不移，埋在废墟底下数以千计的生命才得以挽救。

这些可歌可泣的事迹不仅发生在英雄人物、典型代表身上，而且成为广大人民的普遍行为，这是一种群体的英雄主义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伟大实践；这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和新的发展，是我们党和军队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集中体现和新的发展；是我们坚持不懈地开展传统教育，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硕果，也是“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的具体实践。而这正是红色文化在当代中国的集中体现和新的发展。红色文化为当代中国道德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

二、岗位上弃学生自逃已错，又怎能以曲解自由和公正的道德含义为自己开脱？

在巨大的自然灾害面前，虽然中国没有出现像美国卡特里娜飓风后的哄抢、枪击等社会治安混乱局面，但是，少数地方领导干部和不法商人，利用灾后各方面制度和管理尚未健全的漏洞而假公济私和中饱私囊的行为却见诸报端，不和谐的音符也在神州大

地响起。这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当属被舆论戏称为“范跑跑”的震区教师范美忠。

如果不是因为一篇发在天涯社区的帖子，范美忠这位都江堰光亚高中语文教师，或许不会在海内外有那么高的知名度。他在《那一刻地动山摇——汶川地震亲历记》的帖子中，记录了自己在地震当时以及震后的经历：

“这一天下午照例是我的 IB 一年级 SL 语文课……课桌晃动了一下，学生一愣，有点不知所措，因为此前经历过几次桌子和床晃动的轻微地震，所以我对地震有一些经验，因此我镇定自若地安抚学生道：‘不要慌！地震，没事！……’还没完，教学楼猛烈地震动起来，甚至发出哗哗的响声（因为教室是在平房的基础上用木头来加盖的一间大自习室），我瞬间反应过来——大地震！……然后连滚带爬地以最快速度冲到了教学楼旁边的足球场中央！我发现自己居然是第一个到达足球场的人……这时大地又是一阵剧烈的水平晃动，也许有一米的幅度！……逐渐地，学生老师都集中到足球场上来了……这时我注意看，上我课的学生还没有出来，又过了一会才见他们陆续来到操场里，我奇怪地问他们：‘你们怎么不出来？’学生回答说：‘我们一开始没反应过来，只看你一溜烟就跑得没影了，等反应过来我们都吓得躲到桌子下面去了！等剧烈地震平息的时候我们才出来！老师，你怎么不把我们带出来才走啊？’‘我从来不是一个勇于献身的人，只关心自己的生命，你们不知道吗？上次半夜火灾的时候我也逃得很快！’话虽如此说，之后我却问自己：‘我为什么不组织学生撤离就跑了？’其实，那一瞬间屋子晃动得如此厉害，我知道自己只是本能反应而已，危机意识很强的我，每次有危险我的反应都比较快，也逃得比较快！不过，瞬间的本能抉择却可能反映了内在的自我与他人生命孰为重的权衡，后来我告诉对我感到一定失望的学生说：‘我是一个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却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牺牲自我的人！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而后，范美忠又在

《我为什么写〈那一刻地动山摇〉》中说：“你有救助别人的义务，但你没有冒着极大生命危险救助的义务，如果别人这么做了，是他的自愿选择，无所谓高尚！如果你没有这么做，也是你的自由，你没有错！先人后己和牺牲是一种选择，但不是美德！从利害权衡来看，跑出去一个是一个！”

毫无疑问，当时的范美忠和他的学生都需要安全，都需要逃命。但“对地震有一些经验”的他，却丢下学生逃跑、事后又为逃跑辩护的做法，则引来了人们的思考。凤凰卫视在6月7日的《一虎一席谈》节目中，就该事件邀范美忠与节目嘉宾展开过辩论。不少网友质疑范美忠先跑不但没有尽到教师的职责，而且还没有丝毫的道德负疚感；有的表示很鄙视：跑了就跑了，还不知道羞耻的拿出来；同行说他为教师们丢脸；有人把他看作一个反道德的耻辱符号，骂他丧尽师德；连他的母校北大的老师也“以有这样的学生为耻辱”。但是，也有网友认为不应该对他过于苛刻：毕竟老师也是普通人，遇到危险保护自己是人的本能，而且，范美忠能在网上公开自己的所做所想，至少说明他是个诚实的人，勇于直面自己的人；还有博友贴出了《容不下“范跑跑”的社会正常吗？》的帖子；也有人向他表示了同情，认为他最大的错误就是说了不该说的话了，和我们的传统伦理道德出现了冲突，所以才遭到炮轰；在愿意选“范跑跑”还是“郭跳跳”（在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上与范美忠辩论的时评家郭松民）作为自己儿子的老师时，甚至有不少人会毫不犹豫地回答：选“范跑跑”，绝对不选“郭跳跳”（2008年06月11日08:18红网）。一时间，“范跑跑”在校园中几乎无人不知，而各种媒体在这段时间内也表现出了极大的讨论热情。

其实，范美忠错了。这是一个答案非常清楚也不难理解的问题，只是在有的人那里有意把它搞混淆了。道理很简单，如果范美忠的所想所做是对的，我们没有办法理解自5.12大地震以来党和国家做出的抗震救灾决策，没有办法理解在大灾面前挺身而出的人们，没有办法理解自发参与救灾的志愿者，没有办法理解在抗震救灾中献出生命的烈士们……因为按照范美忠“你有救助别人的

义务,但你没有冒着极大生命危险救助的义务”的逻辑,至今余震不断、险象环生,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救援现场是可以不去的,被压在废墟下的人是可以不救的,受灾的人们吃不上饭、喝不上水是可以不管的……由此推理,战士可以不上战场,消防官兵可以从火场上退却,医护人员可以放弃艾滋病人的手术,武装警察可以不与歹徒搏斗……因此“如果别人这么做了,是他的自愿选择,无所谓高尚!如果你没有这么做,也是你的自由,你没有错!”这样的逻辑能被人们接受吗?

不难看出,范美忠将自己逃命的行为不断拔高的理由,就是“自由和公正”。人性的自由是他一直推崇的价值观,也是最容易蛊惑人心的言论。那么,自由是什么?公正是什么?自由和公正就是为所欲为、想逃就逃吗?

由于范美忠拿“自由和公正”说事,又有不少人不明就里而对其表示同情甚至支持,还有一部分人则和范美忠一样在借题发挥,所以,有必要对“自由和公正”的道德含义作些讨论。

我们知道,自由是个性发挥的必要条件,而自我实现的根本条件又是个性的发挥,于是,自由也是自我实现的根本条件,二者成正相关关系。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工具的改善、科学技术的进步是社会前行的根本动力,而这一切又是人的创造性潜能实现的结果。可见,就总体而言,每个人的创造潜能实现得越好,社会就越富有创造性;每个人的能力发挥得越充分,社会就越繁荣昌盛;每个人的自我实现越完善,社会就越进步。所以,自由还是社会繁荣发展的必要条件,要想使社会繁荣富强,人们就必须拥有更多的自由:人们对大自然认识得越少,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自由就越难以发挥,人类社会发展得就越慢;一个专制的社会之所以不能进步,就是因为人们的思想自由受到了限制,没有了创造和发展繁荣的必要条件。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由不但具有内在价值、是人性最深刻的需要,而且它还是每个人自我实现、成为可能成为的最有价值的人的必要条件、根本条件,从而是社会繁荣发展的必要

条件、根本条件。所以,自由具有最高价值,因而也是社会治理的最高原则,成为社会道德问题研究中应遵循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原理。我们反对专制主义道德,是因其极端违背社会治理最高原则——自由原则,是一种极端的最高的恶。专制主义道德为了保全某一个人或者某一小团体的利益,而违背社会治理最高原则,从而剥夺和侵犯所有人应该享有的各种自由权利,人们都生活于一个遭受全面的奴役、异化和不自由的社会里,个性丧失和思想禁锢的结果极端地阻碍了社会的发展,造成社会停滞不前。

当然,专制主义的道德还违背平等原则。作为社会治理最重要原则的平等原则,就是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即:完全平等是人权、基本权利的分配原则;比例平等是非基本权利、非人权权利的分配原则。

一个人是很弱小的,但人们一起结成社会就拥有了无与伦比的力量,作为缔结社会的一个成员,我们每个人都完全一样地作出了贡献,因为每个人一生下来就自然地、不可选择地、完全平等地参加了社会的创建、缔结,因而每个人缔结社会本身就为社会和他人做出了最大的贡献。缔结社会不仅仅是一种积极的贡献,还是一种具有害己副作用的自我牺牲——牺牲了自己一定的自由和欲望。虽然人的才能有大小、品德有高低、贡献有多少,但在缔结、创建社会这一最基本最重要的贡献和因其所蒙受的牺牲上却完全相同,所以每个人之不论具体贡献如何都应该完全平等地享有基本权利。这就是人权完全平等原则。

非人权权利或比较高级的权利的分配则不应该完全平等,而应该比例平等,即:每个人所作出的贡献与所享有的权利的比例是完全平等的。比例平等原则蕴涵着一个重要的附则,即罗尔斯所主张的获利较多者还必须给较少者以相应的补偿权利。因为获利多者比获利少者较多地利用了双方共同创造的资源:“社会”、“社会合作”。并且,获利越少者对共同资源的利用往往便越少,因而所得的补偿权利便应该越多,获利最少者对“社会合作”的利用往往便最少,因而便应该得到最多的补偿权利。这就是补偿原则。

基本权利应该完全平等分配，非基本权利应该比例平等分配，并且进行差别补偿：这就是作为社会治理原则的平等。平等是最重要的公正，而公正，则如亚里士多德和斯密所言，乃是最重要的道德。所以，平等就是最重要的道德^①。

老师与学生相比，老师应该是获利较多者，老师显然比学生们较多地使用了共同的资源：社会、社会合作。若是没有社会、社会合作，没有学生作为学校的主体，老师们也会一事无成。老师们的贡献之中既然包含着对共同资源的较多使用，因而也就间接地包含着学生们的贡献。于是，老师们因贡献所取得到的权利中便含有获利较少的学生们的一部分。所以，老师应该通过帮助、保护学生等相应方式从自己较多的权利中，拿出相应的部分补偿、归还给获利较少的学生们。否则，老师便侵吞了学生的权利，既不公平也不道德，更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同处于危难之中，在老师和学生得到救助的权力的分配上，学生得到救助的权力大于老师，所以，老师所想所做都应该是保护学生而不是先于学生逃跑。在这次救灾行动中，中国社会普遍形成了一个共同的认识——受灾群众有权得到政府和全国人民的帮助，抗震救灾是全社会的责任，是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的责任。而范美忠怎么就只有自己逃跑的责任呢？

范美忠的行为以及为这种行为辩护的人，在解读“自由”二字时患了选择性理解障碍症候群，从而演化为责任虚无。老师对学生在上课期间负有不可推卸的监护责任，更担负“传道、授业、解惑”的天然职责。如果真如范美忠所言，崇高不是一个好老师的必要条件，那至少，作为一个老师必须有正确的价值观。这种责任虚无的言论和行为，如果影响到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正在形成期的孩子们，其后果将是不言自明的。

对于逃跑的那一瞬间，范美忠事后还解释为“自己只是本能反应而已”，“脑子一片空白”。真的是这样吗？给予了否定回答的恰

^① 写作中参考了王海明等诸多学者的观点，恕不一一列出，在此一并致谢。

恰是他自己。“我发现课桌晃动了一下”，“我对地震有一些经验，因此我镇定自若地安抚学生……”“教学楼猛烈地震动起来”，“我瞬间反应过来——大地震！”“然后连滚带爬地以最快速度冲到了教学楼旁边的足球场中央！”他自己写下的这段文字，再清楚不过地向我们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和他的反应过程，从字里行间里看不出他有什么糊涂的地方，相反，他始终十分清醒、明白的是在护卫自己的学生方面自己没有责任！硬要说他有什么“本能”，那也只是“自私的本能”与“本能的自私”！

范美忠说“先人后己和牺牲是一种选择，但不是美德！”的确，许多情况下人们有不选“先人后己和牺牲”的自由和权利，这是事实判断，是真实的。至于说“先人后己和牺牲”是不是美德，这应该是价值上的判断。价值判断的特点就是主观性和多元性，但最终还是要由人们的社会实践来做出验证和取舍。其实，范美忠在此已经给出了他的价值判断。按照范美忠的说法，我们可以进行如下推理：因为“先人后己和牺牲”不是美德，所以，在危难之时选择“先人后己和牺牲”与不选择“先人后己和牺牲”在价值上等同，所以，正在上课的范美忠先于学生“连滚带爬地以最快速度冲到了教学楼旁边的足球场中央”没有错。真是不敢苟同。这与我们在本次抗震救灾中的共识——“不惜一切代价的救人，能救一个是一个”的要求差距太大了。人不是动物，人可以做到舍己救人。“善为师者，既美其道，又慎其行”（汉代董仲舒）。教师不是单纯的知识化身，而应是知识与道德的和谐统一。

范美忠完全没必要拿“自由和公正”掩饰一时的表现。他如果不是为了亮出自己是忠实的自由主义信徒的底牌，就是另一种炒作的冲动——表明自己是另类。范美忠的行为让我们更加感受到抗震救灾中那些英雄人物的伟大。舍己救人是崇高的，是值得我们永远敬佩的行为。

范美忠，你的确跑远了！

三、弘扬红色文化与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相结合，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责任、爱心、关怀、真诚、勇敢、正义、牺牲，这些在这场大震大灾中表现出来的行为价值，是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的强大精神支柱。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同一社会虽然可以有多个层次多元并存的行为价值，但在民族和国家层面的指导思想、理想信念、意识形态应当是共同的、一元的。这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保持健康、稳定、协调发展的保证，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在大灾大难面前不屈不挠的根本所在。我们在抗震救灾斗争中已取得的阶段性胜利，从根本上讲得益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实际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属性、运行机制之中，也蕴涵着与为人民服务精神、集体主义原则相同或相通的伦理精神和道德原则。发展市场经济的社会化生产的要求之中高度的蕴涵着整体协作精神；市场经济的运行使商品生产者、经营者的个人利益通过满足他人和社会的需要来实现的过程，也把利己和利他有机结合起来，把履行自己的义务同应有的权利统一起来，使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集体主义原则的实现成为可能。所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需要用为人民服务精神和集体主义原则铸造经济组织、社会团体发展所必须具备的合力、动力、凝聚力。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分配和就业方式等日益多样化，人们的价值取向、道德观念、文化生活也日趋多样化。这是社会进步的体现，要承认、推动和发展这种多样化。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强调和坚持我们民族、国家、社会固有的价值，并重视确立和巩固这种价值。无疑，在当代中国的主流价值体系之中，已经把从红色文化的基本价值要素凝聚、整合在一起了。

以“80后”为主体的中国年青一代在这次抗震救灾中展示给社会的就是这种主流价值体系的一个侧面。5000米高空跳伞的是他们；徒步急行军挺进的是他们；呈现无私奉献志愿精神的是他们。让人感佩的，还有大难当头无私无畏的少年英雄林浩等。这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生长起来的一代人，人们曾经认为他们一帆风顺，

扛不住风浪,然而在抗震救灾中,他们英勇地站到共和国的前线,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成为我们弘扬红色文化的青春载体。

而出生于改革开放初期的范美忠为什么反其道而行之?。

其实,大多数人只注意了范美忠逃跑事件的本身,而关于他为什么这样做的背后的答案,虽然许多人用了许多时间在探讨,但实际上,范美忠已经告诉了我们了:“我曾经为自己没有出生在美国这样的自由民主尊重人权的国家而痛不欲生!因为我大学毕业十几年的痛苦与此有关,我所受的十七年糟糕教育与此有关。我无数次质问上帝:你为什么给我一颗热爱自由和真理的灵魂却让我出生在如此专制黑暗的中国?让我遭受如许的折磨!”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认识呢?他的《一个北大毕业生的自白》或许可以做出解释。上个世纪90年代初范美忠进入大学时,他感到中学学的多是谬误。“我的中学老师‘一个也不宽恕’!”他的这一想法,应该是受当时教育的影响形成的。他读大学时,社会上正好有人在反思中小学教育,认为中学语文教育是“用政治来强奸语文教学”;有人批评刘绍棠的《榆钱饭》“所抒写的情感就好比是一只挨饿的狗,一旦主人给他吃饱了,于是欣喜若狂,忍不住对主人摇头摆尾”,这大约是范美忠不感恩的来源;批评毛泽东号召做“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表面上看这是很美好很纯洁的词汇,但再往下推,为了某个崇高的‘共同理想’就可以要求别人牺牲生命,甚至可以强迫你牺牲生命……很美好纯洁的东西由此就转化成了很可怕的东西”。如此一来,为他人牺牲也从学理上被否定了。在这种教育背景下成长起来,或许是范美忠现在的思想行为的一个原因。

在地震灾害面前所出现的一些无德行为,使我们看到,这是一种严重的社会道德缺失所造成的恶果,它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范美忠个人的表现,而是代表了当今社会的一种现象。一些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出现偏差,没有了善良的形象,讲权利不讲义务,讲索取不讲奉献,讲利己不讲利人,有的甚至发展为唯利是图,金钱至上,贪图享受;国家、集体观念及社会公德意识淡化,文明礼